

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

陈嘉庚的故事

(文学传记)

陈彬 编 著

集美航海专科学校



陈嘉庚先生的

故事

陈彬

一、集美学村

在祖国地图上，人们很难找到集美这个地方，它实在太小了。它只是祖国东南弯弯曲曲的漫长的海岸线上的一个小小的村镇。可是，在国内，在海外的华侨中，一提起集美，不知道的人确实为数不多。它之所以蜚声中外，是因为它和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就是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

一八七四年农历九月十二日陈嘉庚先生生于集美。少年的陈嘉庚先生就矢志为社会服务，并认定：“凡有实心公益者，必先由近而远。”陈嘉庚先生一生的爱国活动，正是以集美为起点的。集美凝聚了他的毕生的心血。

集美原是个偏僻的小渔村，叫“尽尾”，或“浞尾”。因为它位于福建省同安县南端的一个小半岛的尽头，浞江从此入海，

故此得名。明代天启年间，这个小渔村出了一名进士，叫陈文瑞。这个进士认为“尽尾也好，“浔尾”也好，都俚俗不雅，含义不吉，便取闽南话的谐音，改为“集美”。但始终没能流行。

集美的遐邇闻名，是从陈嘉庚先生创办学校开始的。陈嘉庚先生在此开办了男女小学、幼儿园、中学和包括师范、财经、水产、航海在内的多种专门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人材。集美学校的师生，来来往往于祖国各地，各海外华侨居住区，口碑传诵，约定俗成，“集美”最终才取代了“尽尾”、“浔尾”，而名扬世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军阀混战，学校常为战事所扰，且出了人命。集美学校为争取和平的读书环境，具请愿书、派代表向国会、国务院等请愿，向南北军政府呼吁，也了舆论的压力，有关当局最终签字承认：集美学校所在范围为“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得名，延用至今。

今日的集美学村，有水产学院、航海专科学校、体育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水产学校、财经学校，以及中学、华侨补习学校、小学、幼儿园等各类大、中、小学十多所，围绕兴学，还办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影剧院……它是著名的文化区、教育区。

集美学村背靠美人、天马二山，面临大海，山光水色，相映成趣，且气候宜人，四季树木长青，鲜花不败，自然景色十分迷人。绿树浓阴之中，巍然^矗立着一片片红墙绿瓦的高楼，水榭亭台。连云耸峙，犹如人间仙境，是风光^旖丽的游览胜地。

学村的东北角的“鳌园”里，^矗立云天的“集美解放纪念碑”后面，万顷^波涛环卫着的，是陈嘉庚先生的^陵寝所在地。“鳌园”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从四面八方，从海内外，前来瞻仰陈嘉庚先生的^陵园，缅怀他一生的光辉业绩。

二、依依故乡情

公元一八九〇年，陈嘉庚十七岁。他在南^軒私塾已经九年了。他敬重老师，勤勉好学，读了许多书。他特别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喜欢《三国演义》、《古文精义》。他懂得爱国和民本的道理，深知祖国传统的为人处事世的美德，不幸，塾^师陈寅先生因病去世，那时读书人不多，再也请不到老师，私塾只好关门。好学的陈嘉庚深深地感到失学的痛苦。

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先生在新加坡经商，知道他失学苦闷，来信要他出洋。陈嘉庚想念父亲，可又不忍离开母亲，他知道新加坡是个繁华的地方，可他更爱脚下这片贫穷但亲切的家乡土地。但他还是得走。登舟临发，听说母亲惜别甚苦，又折回家。过了

几个月，母亲已稍宽心，这才让他起行。

这天，铅灰色的天空飘洒着零星细雨，烟雨遮住了村后的天马山，龙罩了大海，海峡对面的厦门也只剩下一道模模糊糊的影子，从那个方向，偶尔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洋船的蒸汽机的“突突”声。浔江入海处，一条木帆船在轻轻地颠簸着。

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陈嘉庚心事重重，满腹惆怅。他沿着村间小道走来，拖在身后的长长的辫子上沾满了白花花的水珠。他在海岸上停住脚步。

涨潮了。海水湧上来，淹没了半片海滩，一丛丛整齐的礁石在水中露出一个个的小黑点。海滩上还有几个少年在捡海螺。那是他的伙伴。他和他的伙伴经常在这海滩上捕鱼、捉蟹、刮海蛎，还和他们到山坡上的地里挖番薯、拔花生。他们在一起，亲如兄弟。可是，他要离开他们了，他感到一阵心酸。他急忙转过身来，向高坡走去。

高坡上，一棵大榕树拔地而起。大榕树下，是一座残留的郑成功的营垒的石门，旁边有一大黑石头。陈嘉庚站在石门上，抚摸着石门，眼前仿佛显现出郑成功抗清、驱除荷兰的英姿。夏天的榕荫下或在月明星稀的夜晚，他经常在这里听老伯老叔讲郑成功的故事。他对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深为敬仰，他虽不敢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郑

成功一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深感自己应为内忧外患的祖国、为苦难的民族尽一国民之责。

求学无门，报国无路。在他眼前铺开的却是一条通向异邦的茫茫无边的水道。他想着想着，不觉泪流满腮，泪水和着雨滴，

落在石头上。

“哥哥！”胞弟敬贤站在他面前，“船就要开了，阿母叫你呢。”

陈嘉庚拉起敬贤的手：“让我在这儿多站一会，我马上就去！”

风鼓着船帆，船头溅起浪花。陈嘉庚站在船尾仓板上，洒着泪，挥着手，渐离渐远的是他的母亲、胞弟、他的伙伴、老伯、老母，得江、天马山、故乡、祖国……

三、印赠《验方新编》

船到新加坡，在陈嘉庚眼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集美和五口通商之一的厦门一水之隔，陈嘉庚在厦门多少见了些世面。可是厦门比起新加坡来，在许多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

天生的质朴和乡土本色使陈嘉庚对夜总会、茶楼、舞厅、赌场的豪华糜费产生天然的反感。他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潜心学

商。一有余暇，就看报读书。他对新加坡的卫生管理发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后来在一篇叫《住屋与卫生》的文章中，对新加坡的卫生管理这样写道：“初到时（指一八九〇年）市政局已规定生死登记，对市民卫生甚为注意，如自来水、防疫、除蚊、清洁、屠宰管理，均已有设备，每月派人视察市民屋内是否清洁，公共沟渠街道垃圾逐日清扫，运往市外烧毁。”

十九岁陈嘉庚当顺安米店经理。在二十岁和二十七岁^间三次回国。从繁华的新加坡回到多灾多难、贫穷、守旧的故乡，陈嘉庚感触万端。他爱祖国，想效忠祖国，但他又觉得自己不是个改天换地的政治家。他回国所见所闻，使他感到“国势危如累卵”，但又无能为力。而对改变家乡文化落后、不卫生、缺医少药的状况，他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事，也能做点事。

一八九四年冬，他出资二千元在家乡集美社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有一次在新加坡陈嘉庚去看望一个朋友，在朋友家中看到珍藏的一本药书，书名叫《验方新编》，陈嘉庚拿起书，翻了几页，一下子就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这书是哪儿买的？”陈嘉庚问。

“朋友送的，有钱买不着。”朋友答道。他翻开书的一页，指给陈嘉庚看，书上注着“版存日本横滨中华会馆，任人印送。”

“这些方子灵验不灵验？”陈嘉庚掩卷问。

“灵，有神效。”

从友人家归来，陈嘉庚心动起来，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平静。

儿时的阴暗的记忆又在他脑际重新浮现：他十一岁上（一八八四年）闽南发生大旱灾，瘟疫流行，死亡不计其数；幸存者，也大量逃往他乡。许多村落都被废弃。陈嘉庚亲族三十余家，一百多口人死了一半。

“要是能把这书印出，一村送给一本，那一定大有益处。”陈嘉庚想道。

他从小不说空话，说干就干。于是，他准备了款项，托香港朋友汇往日本定印。每本三角，前后印了数次，六七千册。最后一次定印五千册，却因书店倒闭，运输途中失误，被船栈拍卖了。

以后，他又在国内各大商埠登报征求验方，编成《验方新编》交上海世界书局印行。此书散发一部分以后，读者发现印刷错误。人命关天，不得不停止散发。后来，陈嘉庚又找人校对、修正、印刷。但屡遭意外。以后多少年来陈嘉庚一直把它引为一宗憾事。

四、辛亥革命前后

陈嘉庚有胆识、眼光敏锐，事事求实，苦心经营，事业发展很快。出洋后没几年，他父亲就把全部店务交给他经营了。到一九一〇年，除父亲原来经营的米店外，他先后发展了黄梨（菠萝）厂、树胶（橡胶）厂等企业，资产计达四十五万元，还不包括两处树胶园。

在这时期，他耳闻目睹了满清^政府统治下，列强侵略下，祖国国弱民穷的惨象，对腐败的满清政府和列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那时的新加坡，是孙中山领导下的海外革命力量的重要基地。在那里，先后创办了《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对年青的陈嘉庚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开始向往革命。他象仰慕郑成功一样，仰慕孙中山。

一九〇九年，孙中山到新加坡。陈嘉庚由友人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

一天晚上，在晚晴园举行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会议。陈嘉庚也参加了。

会上，孙中山和会员讨论党旗的方案。对“青天白日”旗的底色采用什么颜色，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主张红色，有的不赞成

红色，各据己理，争得不可开交。

孙中山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但不说话。有人给他送来一杯开水。孙中山接过水，顺手把桌子上的红墨水滴一滴在水中。墨水在水中慢慢扩散开，最后，整杯水呈出红色。孙中山举起杯子，高兴地说：“红是吉利的。”说完，一口把水喝下。

再也没有人争论了，大家都赞成红色。

这事，在陈嘉庚先生的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更增加了他对孙中山的崇敬。

第二年，陈嘉庚就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剪掉发辫，与满清决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举行了武昌起义。不久，陈嘉庚从路透社得知福建也已光复。新加坡的闽侨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组织保安会，选陈嘉庚为会长，筹款救济福建以维持治安。会后，发电报查问福建都督是谁，告诉筹款救济一事。

福建复电告：“急需款项、请求速汇。”

陈嘉庚随即筹寄国币二万元，并电告还可继续汇款。在一个月间，又汇回二十万元。福建革命政府收到这笔款后，立即宣传“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尚有百万元可接续汇到。”于是民心安定，民气振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

同年十一月，孙中山从法国乘船回国。十二月中旬到达新加坡。陈嘉庚再次与孙中山会晤。两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谈话中，孙中山问陈嘉庚：“我回国后，如果需要钱，先生能不能帮忙？”

陈嘉庚当即答应：“可以筹寄五万元。”

孙中山在上海登岸后没几天，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从上海赶到南京就职，急需旅费，便给陈嘉庚发了电报。陈嘉庚接电后，立即按许诺的数目汇交。

五、起步步步难

辛亥革命之后，陈嘉庚更是热心向往祖国，希望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他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政治的才干，只有尽自己之所能，由近而远，兴办教育。他决定先在家乡集美社兴办新学，创办集美小学。创业是艰难的，有钱还远不能成事。每迈进一步都要历经艰辛。

那时，整个中国教育十分落后。集美也一样。全集美社分六、七房，各房办一私塾，仅有一、二十男生，女孩不得入学。十几岁的小孩，成群斗殴取闹，有的还一丝不挂，光着屁股，仿佛回

复到上古野蛮状态，叫人痛心。

集美各房虽同出一宗，但多年来，分成两大派，积怨很深，屡次械斗，死伤数十人。要办学，就要求全社一致，将各房私塾停办才行。大人又都怕小孩集中在一起，口角打架，生出事端，引起大人的纠纷，重动干戈，都不愿集中办学。陈嘉庚走东家串西家，找各房房长商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排解纠纷，好容易才说服了两派。于一九一二年春办起集美小学，暂借大祠堂和附近的祠堂上课。全社的男孩都入了学。

小学办起来了，接着就要建校舍。集美是个半岛，三面环海，土地极少，一年收成不及两个月口粮。社里居民住宅也十分拥挤。村外虽有空地，但公、私坟墓象鱼鳞似的，重重迭迭，比比皆是。村民又都迷信风水，哪能动得。要找一块地建校，真是难乎其难。陈嘉庚为此大伤脑筋。

幸好，陈嘉庚家门口有一大鱼池，池中有一块小洲，鱼池面积有数大亩，是海难围堤而成的。陈嘉庚最后看上了这个地方。这也是几股合成，其中一股是他家的，陈嘉庚费了不少口舌，并出两千元向各股主买下鱼池，作为集美校产。地既买就，就动工兴建。在池的四周开了深沟，把挖出的土填到池中，在上面建造木质校舍和操场。

在以后的十年中，集美学校迅速扩大，增设了几个专门学校。一九二二年，陈嘉庚再次回国，选中一片坟地，准备建筑校舍。

这时，由于陈嘉庚的影响和多方面的工作，村民已不那么迷信风水。但到破土时，却又都畏畏缩缩，不敢上前。他们都怕挖坟墓，触犯鬼神。陈嘉庚见状，提起手杖，走上前去，在这个坟头敲敲，那个坟头戳戳，笑着对村民说：“没鬼。挖！有鬼也不干你们的事，算我的帐。”

村民象吃了定心丸，象吞下豹子胆，挥起镐头，平掉一个个坟堆。

楼建成了。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这座楼取名“延平楼”。楼的前面，正是陈嘉庚儿时在那里听郑成功的故事的大榕树和郑成功营垒石门的遗址。陈嘉庚在石门旁边的大石上，勒下四个大字“延平故垒”，以志对民族英雄的敬仰，激励后人继承爱国遗风。

六、柴草费和稀饭津贴

小学创办以后，集美社陈姓所有子弟都入了学。陈嘉庚非常

高兴，立志要“把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

一天，陈嘉庚看到一女孩在折树枝，便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小女孩瞪着大眼睛望着他，不说话。

陈嘉庚让女孩带路到她家，找到她父母，劝他们让女孩读书。

小女孩的父母说家穷，缺人手。女孩子家的，得帮着捡柴草、刮海蛎。再说，男孩女孩在一起读书，打打闹闹，没个规矩。

陈嘉庚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他很理解村民的苦衷。他当即劝小孩的父母把女孩送来读书，并提出每月给他们家三块钱买柴火。

三块钱。在那个时候，对这么一个穷家说来，可是一笔老大不少的款项呀！这对父母感动得话都说不出。

象这种情况远不止一家两家。

一九一七年二月，陈嘉庚又办了女子小学，招收本社女生，并且规定，每个女生每月津贴二元至三元柴草费。结果收女生五十名。

陈嘉庚年轻时尝过无师的苦头。办学后，更感到培养师资的重要。集美小学需要校长、教师七名。而当时整个同安县教师中的师范毕业生（包括简易师范毕业生）只有四人。其中一

人还改行做生意去了，最后只聘到两名。

陈嘉庚想改变福建教育颓废的局面，把教育普及到偏僻的农村，需要大量的教师。

当时，福建只有两所师范学校。一所在漳州，经费缺乏，没有什么成绩。另一所是福州市立师范。这所师范膳宿等费全免，而且名气很大。一入学就象前清秀才，毕业就相当于举人老爷了。因此，这学校的名额都让一些膏粱子弟占满了，从不公开招生。这些人不经考试，程度参差，而且毕业后都不愿意拿二、三十块钱，到乡下当教员去。

陈嘉庚痛切感到必须创办师范，而且必须破除旧例，不能象省立师范那样，有名无实。

一九一八年，陈嘉庚在集美增设师范、中学两部。师范主要招收乡下贫苦的学生。只有这样的学生，经过几年训练以后，才能回到乡下去，为发展乡村教育尽力。师范初办时，收生三班。学校致函闽南三十多县的勤学所，每大县代招穷苦学生五、六名，小县三、四名。第一期共招一百多名。入学后，经过严格的检查和复试，违章入学的、不合格的退回。这样，学生的素质都不错。

师范学生享受优厚的待遇，膳宿费全免，被席蚊帐由学校统一发给。学校一日三餐，两干一稀。一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和闽南学生，不愿吃干饭，三餐都吃稀饭，每月发稀饭津贴二元。

这些穷苦学生学习刻苦，毕业后大部分回原籍执教，也有人到南洋去，传播祖国文化。

七、手足兄弟

陈嘉庚兴学，犹如在荆棘丛生的荒野中辟路，困难重重。他办教育的经费来自他的实业。在海外经营实业，正如在狂风险浪中行船，时时有风险。兴学在国内，实业在海外。陈嘉庚心分两地。可以想象，他是怎样地费精劳神，煞费苦心。

在陈嘉庚的兴学和实业经营中，他的弟弟陈敬贤是他得力的助手。

陈敬贤十三岁到新加坡，十七岁就开始协助陈嘉庚经商。两兄弟志同道合，相互信赖。一九一〇年，两人一起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二年，陈嘉庚回国办学，新嘉坡的商务全由陈敬贤主持。一九一六年，陈嘉庚回新加坡振兴实业，便派陈敬贤返国办学，筹建师范和中学。

那时陈敬贤少年英俊，为人诚恳热情。他回集美办学，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深夜才歇息。他巡视工地，探望师生，整天奔忙，不计寒暑，无一日中断。他先后主持兴建了大礼堂和多座教学楼，

以及包括电灯厂、自来水厂在内的许多公共设施。一九二六年，鲁迅《聪明人做不成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讲演，就是在陈敬贤主持修建的大礼堂里作的。

陈嘉庚极注重校长、教师的选择，特别是对校长，更是倍加注意。他认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陈敬贤为了聘校长、教师，四方奔走，先后到过天津、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一九一八年，师范和中学准备就绪，正式开学。在开学词中，陈敬贤根据陈嘉庚的意见，提出“诚毅”二字为校训。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为创办厦门大学，陈嘉庚返居国内。陈敬贤又南渡新加坡，负责经营陈嘉庚公司的庞大企业。后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疾，才又重返集美，一边休养，一边主持陈嘉庚公司在国内各分行的业务，同时，筹办集美农村学校。农林学校校址选在集美十数里之外的天马山麓，陈敬贤不辞劳苦，带病实地考察规划校舍、农场、牧舍。

陈敬贤两次到日本就医。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发生。陈敬贤激于爱国义愤，置自身的健康于不顾，毅然带病离开日本返国。

他笃信佛教，先后在杭州灵隐寺、厦门的南普陀等地养病。一九三六年二月，陈敬贤因患唇疔，加上旧病，不幸壮年去世。

陈敬贤的早逝，对陈嘉庚说来，如失左手右臂。陈嘉庚极为